



共渡难关岂容铺张浪费

——代表委员批评公款出国游、建楼堂馆所等现象

近日，中办国办连续发出两个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坚决制止公款出国出境旅游。这在出席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中引起热议。

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指出，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全国上下应“共渡难关”。但当前个别干部依然公款出国旅游，个别国企高管薪酬高得离谱，个别地方仍大建楼堂馆所，这种与当前形势极不协调的铺张浪费现象必须坚决制止。

公款出国游：

既浪费又败坏干部形象

广东省肇庆市纪委日前通报了该市端州区委副书记、区长谭日贵带队利用公款违纪出国旅游的情况，决定免去谭日贵区委副书记职务，并责令其辞去端州区区长职务。这是继江西新余和浙江温州同类案件后又一起公款出国旅游案件。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8年5月中旬到11月底，全国就取消计划内的因公出国出境团组1100多批、近7000人次，制止违规出国出境团组

550多批、近4000人次。

谭日贵等人为期14天所谓的“招商考察”，没有半点与招商、政府工作有关的内容，竟是乘坐豪华观光轮、选购南非钻石、欣赏肚皮舞等等。

正如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审计局局长王耘农所指出的：“公款出国旅游问题，既耗费财政资金，又败坏干部形象。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种做法肯定不利于干部更好地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应对危机、克服困难。”

全国人大代表任建国也认为，公款私用，以公务之名行腐败之实，是对纳税人的不公平。

“一些干部出国旅游，回来却把费用让企业报销，还加重了企业负担。”在企业工作的全国人大代表高宝玉说。

这次中办国办通知要求坚决制止公款出国出境旅游，对顶风违纪的要从严处理并曝光。王耘农代表认为，各级纪检监察、审计机关应当坚决执行中央规定，高度重视查处这类案件，一旦发现一追到底。

国企超高薪：

超出了公众心理承受底线

一些国企高管“天价薪酬”现象令国际金融危机“寒流”中的公众颇感不满。

“企业负责人责任大、压力大、风险大，领取高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说，“但有些国企负责人薪酬高得离谱，一个人就把上千人的饭碗都‘端’了，超出了劳动者及社会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偏离了公平与效益兼顾的底线。”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认为，企业负责人领取高薪本来是符合国际惯例的，但中国国情有所不同，一些国企资金由国家出、价格由国家定，企业的财富效应源于这些特殊政策和垄断性高利润商业机会，其负责人薪酬过高显然不合适。

当前，一些西方国家相继出台了限制政府救助的金融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的规定。秦希燕认为，我国也应当限制和降低那些过高的国企负

责人薪酬，统筹兼顾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各类国企之间负责人的薪酬标准，实现公平与效益。

从长远看，秦希燕建议，应建立由职工代表大会来决定的国企负责人薪酬决策机制，并与业绩优劣挂钩；同时，增强国企负责人薪酬透明度，防止“暗箱操作”。

楼堂馆所：

挤占挪用宝贵财政资金

有网友曾经在一个帖子里集中“展示”了各地豪华办公楼、内部宾馆、培训中心等的图片，这些富丽堂皇的楼堂馆所往往属于各种“实权”部门或国有垄断企业。

“审计中我们发现，相当多的楼堂馆所是以各种名目挤占挪用财政资金建起来的，根本就没有合规的审批手续，脱离了财政预算的管理和监督。”王耘农代表指出。

秦希燕代表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家加大投资力度，各地项目的热情高涨。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严防出现楼堂馆所项目和劳民

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据统计，近一年来，全国共查处违规修建楼堂馆所案件97起，查处面积9.43万平方米，查处领导干部14名。

这次中办国办通知规定，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到2010年底，各级党政机关一律不得新建办公楼，不准建设培训中心、宾馆、招待所等楼堂馆所。经批准已开工建设的，要严格执行规定标准。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杨庆育认为，这些规定非常有针对性。“应对危机，政府确实应首先从自己做起，做好表率。”

“我们重庆发展改革委作为重庆基本建设项目审批单位，一定从审批环节就把兴建楼堂馆所坚决挡住。”杨庆育代表表示，中办国办的规定都非常具有操作性，只要严格遵守中央规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全国人民一定能够团结一心渡过国际金融危机这道难关。

(据新华社4日电)

人人享有负担得起的基本医疗服务

——代表委员期待新医改

“目前医改方案确立的目标是‘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我觉得这还不够完备。”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医科大学副校长戴秀英说，“我认为更好的表述应该是‘让人人享有负担得起的基本医疗服务’。”

“‘人人享有’体现的是医改的均等化，‘负担得起’强调的是它的公益性。‘人人享有’是基础，‘负担得起’更重要，二者缺一不可。”戴秀英委员进一步阐明了她的观点。

记者与来京参加两会的代表和委员谈起医改，从他们口中听到的最多的就是均等化和公益性。

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

“我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戴秀英委员说，“但目前还存在许多问题，较为突出的就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形成了‘穷人帮富人’的怪圈。”

她说，目前医疗资源分配总体情况是，政府投入与满足老百姓实际需求之间还有不小的差距，而且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占全国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受70%医疗资源，70%农民仅享受30%医疗资源”。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红十字会曲阜医院院长姜健认为，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视力度，增加了对卫生防疫、疾病控制的投入，乡镇及社区卫生服务基础设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负责承担辖区内居民基本医疗服务的县、区医院，其被重视程度及财政投入力度均趋于边缘化。

全国政协委员红花是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蒙医院院长。她所在的医院是一家二级乙等医院，与县人民医院共同承担着为全县4万人口提供医疗服务的任务，“由于经费不足，无力购置先进的诊疗设备和引进优秀人才，县里尤其是农村居民生病后要么不看，要么拖得严重了去德令哈或者西宁



经过全民征求意见，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已“箭在弦上”。对这项关系每个人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群众和医务工作者充满了期待。长期以来，各界对药价高、看病难、个人负担重、公立医院现行机制弊端多等“痼疾”反映强烈，新医改方案在推行中能否准确命中这四大要害？
新华社发

等级高的医院就诊。我们的处境很尴尬。”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东营市蜜蜂研究所所长宋心仿说，城乡居民的卫生服务需求中，近80%属于基本卫生服务，在社区即可以得到满足。“由于我国乡村卫生服务机构尚不健全，加之缺乏有效的政策导向，使得本该在乡镇得到的医疗服务却流向城市大医院，形成了需求的正三角形与卫生服务供给的倒三角形的不匹配状态。”他说，“投入失衡是造成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主要因素。新的医改方案应该对这一问题着力加以纠正，简单地说，就是把更多的钱投向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

该姓公的姓公该姓私的姓私

“城里的三级甲等医院虽然姓公，却在追求效益；村卫生所虽然姓私，却应该承担公益性公共卫生服

务任务。”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福建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林绍彬说，“这也是目前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一个亟须纠正的倒挂现象。”

林绍彬委员说，公立医院改革不应只针对城市中的大医院，“只要是向群众提供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医疗机构都应该突出公益性”。

他认为公立医院改革应该双管齐下，“对于那些知名医院，政府可以考虑逐步对其‘断奶’，因为这些医院完全有能力自己养活自己并得到良好发展。省下来的经费应用于向基层公共医疗机构，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村卫生所‘输血’”。

林绍彬委员说，目前体制问题和经费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村卫生所的发展。最近几年林绍彬调研了福建省十几个县的村卫生所，发现由于收入少，待遇差，没有解决“身

份”问题而缺乏社会劳动保障，村人才流失情况严重。

据他介绍，福建的一个县2005年注册村医有884名，2008年注册村医只有729名，不到2年时间，流失村医155名；致使389所村卫生所中，空白村卫生所达38所。

戴秀英委员说，她走访的一些乡村，“村卫生所牌子虽然还挂着，但已经变成‘夫妻药店’了”。她说，医改应该明确一个方向，那就是引导更多优质医疗资源走向基层，“深入社区，深入乡村。不但要进得去，还要留得住”。

她建议，对于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的乡村医生，要把他们吸纳进乡镇一级医疗机构，“解决他们的身份问题和待遇问题”，同时推动乡镇一级的医疗机构向基层派驻医生，努力实现农村人口小病不出村。

基本药物制度要保护廉价药

“农村人小病不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药太贵”，全国人大代表王元成来自农村，曾是一位“打工仔”，熟悉那里的情况。他说：“这些年国家几次调低药品价格，但不知为什么，每一次降价后，一些便宜而管用的药就消失了。”

王元成代表的疑问代表了很多人的疑惑。

戴秀英委员解释说，疗效好、价格低的药物之所以容易被“淘汰”，主要原因在于制药企业要赢利，而这些药利润低。

她说，廉价药退出市场的路径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像阿莫西林这样的广谱药。“其实阿莫西林很便宜，三块钱左右一盒。对企业来说，利润也很低。为了追求更高利润，一些企业就会通过改剂型，推出新的‘阿莫西林’，同时提高价格。而药品市场竞争激烈，只要有一家企业这样做，马上会引来其他企业效仿。就没有企业再生产传统剂型廉价的阿莫西林了。”

戴秀英委员说，另一种情况就是那些患者相对少，非广谱性的药品，“这类药品吃的人较少，市场较小，再加上价格便宜，自然没有企业愿意生产。”她说，此外大医院“以药养医”的做法也加速了廉价药的退市。

戴秀英委员认为，作为医改的重要环节，建立基本药物制度时必须对廉价药给予保护，“一方面药监部门应出台政策，限制廉价药改剂型上市；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可以对廉价药的生产企业给予一定优惠和补偿，例如减税或以保护价收购等。”

“如何破解看病难、看病贵，是全国两会有一个老话题，讨论了很多年，我希望新医改方案能够尽快出台，最大限度地实现普惠，力求公平。”戴秀英委员说。

(据新华社4日电)